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olitical Market Games: Structure and Behavior

Weiting Huang

Jilin University

November 2008

Online at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5333/>

MPRA Paper No. 15333, posted 23. May 2009 02:36 UTC

政治市场博弈：结构与行为

黄卫挺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利用博弈论方法，本文研究了不同政治市场结构下的利益分配和参与者行为。理论模型显示：垄断政治市场中，参与者的参与剩余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权力垄断者；但是，当政治市场存在竞争时，比如寡头政治市场，将导致利益反向再分配，即政治寡头的主导者剩余将作为租金转移给参与者；另外，通过对点模型的扩展，得到了政治结盟的基本分布特征。基于这些结论，本文讨论了“中心——边缘”命题中存在的发展陷阱，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和经济地理邻近带来的政治影响等理论问题；并以战后日本发展和两岸“外交战”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政治市场 结构与行为 租金 剩余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JEL CODES: F59 F02 D78

Political Market Games: Structure and Behavior

Huang Weiti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market structures influence the behavior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was studied in the framework of game theory. Theoretical model showed that in the monopolized political market, the participation surplus of participants would serve as the rents of monopoly power. However, when the political market competition, such as the oligarchic political market, would lead to reverse the re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that is, the leaders' surplus of political oligarchy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participants. Additionally, in the extended spatial model, we concluded the basic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alliance.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we discussed the "center-periphery" proposi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re exist a trap of development; we also pointed out how ideological conflic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conomic geographic proximity would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In the end, two cases, that is, Japan's postwar development and cross-strait "diplomatic war" were studied.

Keywords : political market structure and behavior rents surplus

JEL Codes : F59 F02 D78

作者介绍：黄卫挺，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hwt@email.jlu.edu.cn 或 weiting.huang@yahoo.com.cn

一、引言

政治市场结构如何影响政治行为体行为是政治学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博弈论方法为此建立一个标准的模型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对理论与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解释。由于政治学分析存在层次性,大到国际体系,小到集团政治,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而政治行为体也可以是国家、组织和个人,所以,本文统一将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体标准化为博弈论专业术语“参与者”(泰勒尔,1997)。这样,由不同参与者构成的某个政治现象或事件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市场”。因此,本文所指的政治市场可以是指不同国家就国际政治展开的利益较量,也可以是指国家内部不同政党的权力竞争行为,亦可以指组织内部的派系政治。总之,只要政治行为体,即参与者之间存在某种利益上的关联,特定的政治市场就将产生。术语的标准化为理论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基础,但是,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以“国际体系”为背景进行理论阐述,在讨论部分,我们再回到更广泛的背景对理论进行讨论分析。

国际关系主流观点认为(蔡翠红、倪世雄,2006),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它由国家行为体组成,主要指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因此,在理论部分,我们将暂时假设“参与者”即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而“政治市场结构”即为“国际体系结构”。具体来说,本文将以国家之间的“结盟”为线索对不同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国家行为、利益分配(寻租)进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承认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前提下研究国家行为,而不对国际政治结构本身的形成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换句话说,本文是在给定的宏观架构内研究微观个体行为。另外,国际政治体系存在多种结构形态:(无极)无政府状态、单极霸权世界和两(多)极世界体系。如果将这些政治市场结构与同样建立在博弈论之上的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得到:无极无政府状态对应自由市场、单极霸权体系对应于垄断市场结构、两极体系对应于寡头市场结构,多极体系(要求一定的国家极数目)对应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最后,本文忽略“国际制度”的存在,或者将其理解为国家行动的内生结果,即微观行为基础决定的宏观架构。当然,这样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制度重要性的否定,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研究的经济性”。本文认为,在霸权衰落之后,由不同国家通过讨价还价,公共选择产生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对维护世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制度本身是一种由竞争导致的合作结果,它可以通过理性预期引导和约束国家行为。

在国家理论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就本文分析框架内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类似的讨论,详细可参考 Alesina 和 Spolaore (2003), Bolton 和 Roland (1997), Alesina、Angeloni 和 Etro (2005) 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两点:其一,虽然冲突研究显得更为常见,但本文所说的利益关联并不特指利益冲突,因为有些时候,政治市场中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其二,特定政治市场的产生即意味着博弈的存在。

虽然如此,对于政治市场结构本身的动态演变研究,本文倾向于微观行为基础决定宏观架构的逻辑。博弈论对该逻辑范式有过专门研究,经典之作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2007)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二、政治市场博弈的理论模型

与经济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也存在类型众多的政治市场,比如各国就某个国际事务进行的筹商和谈判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市场,国家内部各政党的竞选活动所形成的权力市场。在国际政治市场中,国家之间的结盟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活动,不同国家可以在众多领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结盟,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国家俱乐部。联合国是当前最大的全球综合性国家俱乐部,而区域性的国家俱乐部(如欧盟)、以经济为主的各类贸易协定(如WTO)、各类国际司法协议等更是普遍存在。本文先以垄断政治市场为切入点建立模型,然后从垄断过度到寡头结构。

(一) 垄断政治市场(单极世界)

假设国际政治市场中存在 N 个国家(参与者),在垄断政治市场结构下,单极国 A (主导者)对国家俱乐部的会员吸纳、资格标准确立具有垄断权力。当国家俱乐部 A 的规模为 $Y \in [0, N]$ 时,国家 A 所获得的支付为 $R_p(Y)$,本文假设该支付函数满足稻田性质: $R'_p(Y) > 0$,且 $R''_p(Y) < 0$,为了便于论述,再令 $y = Y/N \in [0, 1]$ 。上述假设的含义非常直观,即 A 国从国家俱乐部中获得的收益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呈正相关,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如,国家数目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的扩大;但是,俱乐部的规模扩大并不是无成本的,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俱乐部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将变大,因此,支付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它是对 A 国边际收益的一个惩罚,即边际收益递减。需要指出的是,会员国的综合实力,即国家俱乐部的“质量”对 R_p 来说更为重要,但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以国家数目来简单代表这些变量已经足够。

如果国家 i 要加入国家俱乐部 A ,当不存在寻租(此处并不单指国家极利用权力寻租,后文对此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国家 i 加入该俱乐部的支付为

$$R_i(Y) = P + \beta y - C_i \quad (1)$$

式(1)中, P 代表俱乐部主导国家给 i 带来的收益,它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无关,称为直接收益; βy 代表的是国家俱乐部规模给国家 i 带来的收益,称为规模收益,而 C_i 则是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的直接成本(暂时设为常数)。

另外,我们还需要假设国家 i 不选择加入国家俱乐部的保有支付为 R 。当国家极 A 不对参与国进行寻租,国家 i 选择加入俱乐部的参与条件是:

虽然在经济博弈理论中,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s)是最常用的标准假设,但此处的二阶导数假设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影响。可是,如果要研究国际政治结构的动态特征,这样的假设是必要的,因此,本文保留该假设。

对规模收益和直接成本的不同设定都可以作为模型扩展的突破口:式(1)将规模收益设定为一次线性,但如果我们将规模收益视为网络效应,那么在不同的函数设定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研究政治结盟的动态规模与路径特征,当然,这暂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另外一方面,在本文的空间扩展部分可以看到,直接成本的改变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结论。

$$R_i(Y) \geq \underline{R}$$

然而，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由于国家 A 具有垄断权力，他会利用这种垄断权力进行寻租，假设国家 A 向国家 i 收取租金 $M \geq 0$ ，则国家 i 的参与条件将变成

$$R_i(Y) - M \geq \underline{R} \quad (2)$$

与此同时，国家 A 是否接受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的决策标准是最大化其收益，即其目标函数为

$$\max \{R_p(Y); R_p(Y+1) + M\} \quad (3)$$

结合国家 i 的参与条件(2)和国家 A 的决策目标(3)，我们可以得到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下国家 A 收取的最大垄断租金

$$\bar{M} = R_i(Y) - \underline{R} \quad (4)$$

式(4)说明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下，单极国家 A 的垄断租金正好等于国家 i 的“参与者剩余”。这里，参与者剩余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剩余”是类似的，它是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所获得的总收益（ $P + \beta y$ ）超过总成本部分（包括 C_i 和机会成本 \underline{R} ）的净收益。从(4)式可以看出，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中，参与国的这种“参与剩余”将被作为垄断租金全部转移给国家极（主导者）A。

（二）双寡头政治市场（两极世界）

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垄断权力寻求租金最大化，从而使其他国家的参与剩余发生转移。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由于多寡头市场和双寡头市场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双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下的国家行为。

首先假设除了国家极 A 之外，世界还存在另外一个国家极 B，并且假设国家极 B 主导的国际俱乐部规模为 X ，国家俱乐部 A 与 B 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此时国家 i 加入俱乐部 A 的参与条件不仅需要满足(2)，同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R_i(Y) - M^a \geq R_i(X) - M^b \quad (5)$$

当(5)取“=”时，国家 i 选择加入俱乐部 A 与 B 是无差异的，将(1)式代入(5)的无差异式，可以得到：

$$M^a - M^b = (P^a - P^b) + \beta(y - x) \quad (6)$$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国家 i 的选择均衡状态下，国家极收取的租金差异（ $M^a - M^b$ ）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差异（ $y - x$ ）成正比，国家俱乐部的相对规模越大，意味着主导国家可以收取的租

具体来说，针对多寡头国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可以通过对 Salop（1979）的圆形城市模型进行扩展得到。

金也相对越多。这一点正是规模效应带来的主导国家权力收益。以上是基于国家 i 的选择分析，(5) 是国家 i 的一般参与条件。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针锋相对的竞争时，条件(5)将得到松弛，下面将讨论一种特殊的情形对此进行说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实力竞争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往往表现为一种强弱互现的特征，但是为了刻画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下的静态特征，本文构造如下环境：在国家 i 作出选择之前，国家俱乐部 A 与 B 完全相同，即 $X = Y$ ，这将导致 $R_p^a = R_p^b$ ，再假设不存在寻租时，国家 i 参与俱乐部 A 与 B 直接收益是相同的，即 $P^a = P^b$ ，这意味着 $R_i(Y) = R_i(X)$ 。因此，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以上假设说明了国家 i 的选择将决定国家俱乐部之间的竞争格局，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国家 i 掌握“关键投票”。在这些假设下，我们可以看到(5)将退化为

$$-M^a \geq -M^b \quad (7)$$

此时考虑国家 A 与 B 的决策，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他们只需要考虑国家 i 的参与条件(2)，并在此约束下最大化其目标函数(3)；然而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由竞争带来的约束(7)(即(5))也将成为他们的最优化约束，本文将此称为“竞争约束”。这样，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我们可以得到目标函数的最优均衡解为：

$$\underline{M} (= -M^a) = R_p(Y+1) - R_p(Y) \quad (8)$$

与(4)式对比，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主导者收取的租金发生了符号改变，这意味着租金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垄断者寻租变成了参与者寻租，可以认为，竞争的引入导致了政治市场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另外，分析式(8)可以发现， \underline{M} 事实上是国家俱乐部的“主导者剩余”，它与经济学中的“生产者剩余”是类似的，是国家俱乐部主导国家从结盟中获取的净收益。在关键投票的情况下，这种主导者剩余由于存在竞争约束从主导国(国家 A)转移给了参与国(国家 i)。

(三) 点模型的空间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本文假设所有的国家(除国家极 A 和 B)都是同质的，即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成本与收益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不同国家之间会因为文化和政治理念等存在巨大差异，即参与国是异质的。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用异质性参与者代替代表性参与国者，为了表征这种差异性，本文将在上面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其进行空间扩展。事实上，熟悉古诺模型的读者会发现，本部分的模型实际上是标准的古诺空间模型。首先，本文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均匀的分布在 $[0,1]$ 区间内， $[0,1]$ 区间上的不同点代表了不同的国家(注意，这与

事实上，2008 年 8 月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发行了一部名为《关键投票》(Swing Vote) 的电影，暂且不对该电影作价值方面的判断，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本文所假设的这种政治市场博弈，其结果可以帮助理解本文的结论。

第 1 部分的假设 $y = Y/N \in [0,1]$ 是一致的); 另外, 国家极 A 和 B 分别位于 $[0,1]$ 区间的两端, 即国家 A 处于端点 0, 而国家 B 处于端点 1。为了表示参与国之间的异质性, 下面我们将放松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的直接成本 C_i 是固定的假设, 即: 如果国家 i 在 $[0,1]$ 区间上的坐标为 y , 它加入国家俱乐部 A 的直接成本为 ty^2 , 且有 $t < \beta$, 加入国家俱乐部 B 的直接成本为 $t(1-y)^2$ 。读者可以发现, 该假设是标准的, 这意味着, 当国家 i 与国家极 A 越相似, 它加入该国家俱乐部的直接成本越小, 而其加入国家俱乐部 B 的直接成本越大。对于国际政治来说,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具有相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国家结盟的成本会低于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家结盟。将上述直接成本函数代入(5)式, 并取无差异均衡 (即 “=”) 可以得到:

$$(P^a + \beta y - ty^2) - M^a = (P^b + \beta(1-y) - t(1-y)^2) - M^b$$

求解上式可以得到边际参与国 y^* 的坐标:

$$y^* = \frac{1}{2} - \frac{(P^a - M^a) - (P^b - M^b)}{2(\beta - t)} \quad (9)$$

所以, 此时选择加入国家俱乐部 A 与 B 的国家数目分别是:

$$Y = N \int_0^{y^*} dx = Ny^* ; X = N \int_{y^*}^1 dx = N(1 - y^*)$$

图 1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表达式的含义, 在异质性成本的作用下, 不同国家对国家俱乐部的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极可收取的租金差异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差异 (公式(6)), 相反, 此时它们的选择具有基本倾向, 即式(9)中的第一项 $1/2$ 。事实上, $1/2$ 是一个标准的临界点, 当国家极收取的净租金相同或者为零 ($P^a - M^a = P^b - M^b$), 边际参与国的坐标正好是 $1/2$ 。联系第 2 部分的公式(6), 此时有 $y = x = 1 - y = 1/2$ 。因此, 差异化成本决定了国家行为选择 (结盟) 具有内在的基本倾向, 这种倾向决定了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基本构成; 同时这也意味着端点附件国家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 比如 “文明的冲突”。

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 我们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关键投票的作用机制。第 2 部分本文直接假设 $R_p^a = R_p^b$, 而上面的分析证明了该假设, 在无寻租状态下, 具有差异化加入成本的临界国坐标为 $1/2$, 此时国家极 A 与 B 的支付都是 $R_p(N/2)$ 。在这种 “均势” 状态下, 国家俱乐部可动用的 “调节” 工具只能是(9)式的第二项, 即收取的净租金, 当国家极 A (主导国) 收取的租金越少, 或者转移给参与国的 “剩余” 越多, 则临界国家坐标越向右移, 国家俱乐部 A 的规模越大。与第 2 部分的分析不同, 此处我们能够看到潜在 “可调节” 国家的分布: 国家俱乐部能争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哈佛大学萨缪尔·亨廷顿于 1996 出版的著作, 该书出版之后的 “911 事件” 被认为是文明冲突的典型事件, 详见亨廷顿 (2006)。

取的只能是围绕 $1/2$ 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国家会根据租金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国家俱乐部。如果简单地将 $[0, 1]$ 区间进行划分，我们能够得到三段两种类型的国家分布：与 0 和 1 端点紧密相连的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俱乐部的“基本盘”；与 $1/2$ 紧密相连的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俱乐部的“调节盘”，或者采用竞选理论术语，将其称为“中间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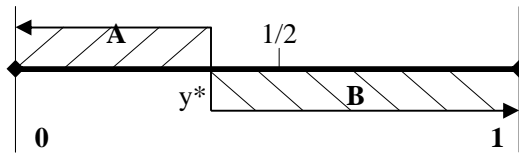


图 1 寡头政治市场结构的空问模型

三、对模型的讨论和应用分析

从理论模型可以看出，不同国际体系结构（政治市场结构）下的国家（参与者）行为是不同的，并且根据空间模型的扩展，可以得到结盟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征。下面，本文将基于这些结论对政治学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一）霸权世界的财富两极分化

从单极世界模型可以看出，只有当国家俱乐部的主导国和潜在参与国结盟的支付都大于不结盟时的支付，结盟才有可能实施。事实上，结盟意味着这是一种双赢的状态，即主导国和参与国在政治行动中都得到了好处，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结盟行动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当主导国使用它的垄断权力的时候，模型显示参与国的行动收益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国，即垄断权力扭曲了双方的利益分配，从而使得双方更接近于“一赢一平，赢者通吃”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该结论的得到并没有考虑武力威慑在利益获取方面的影响，因此，即使在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这种利益扭曲也是存在的。

以上结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中心——边缘”的财富两极分化。沃勒斯坦认为，剩余价值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倾斜的，具有向心性，从而导致中心的剩余价值积累速度要快于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积累，剩余价值向心性的程度依赖于中心区域对技术、资本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沃勒斯坦，2000）。本文的结论与此一致，首先，中心区域对技术、资本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体现了垄断权力的存在，而这种垄断权力在经过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将转变为垄断租金，如沃勒斯坦分析中的剩余价值。但是本文的结论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垄断租金的收取是双方都同意的，并且是经过理性计算的。这就意味着“中心——边缘”体系存在着内在的发展困境，边缘国家试图通过与中心区域的各种结盟方式获得发展机会，而中心区域也试图通过这种结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虽然两者的一致行动将使得全局的收益增加，但垄断权力的介入却使得分配机制发生扭曲，造

成了财富差距的扩大。因此，虽然都是基于主体行为的自主优化选择，但垄断权力的存在会造成边缘地区的“发展陷阱”。

（二）空间扩展的来源——意识形态、文明与经济地理

空间扩展的关键在于直接成本函数的设定。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这种差异化的直接成本被视为交易成本，如运输费用。但是，在政治市场中，将其看作运输成本显然不合适，那么这种政治“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空间一词似乎很具迷惑性，它让人容易联想到“地缘”，但是考察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地理版图上的邻近往往不是结盟的催化剂，相反，它却经常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地缘因素并不是这种政治交易成本的直接来源。本文认为，不管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文明、“主义”等政治理念与文化的差异才是政治交易成本异质的根本所在。历史上，美苏争霸是在意识形态旗帜下的两大阵营较量，而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亨廷顿（2006）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更是这种交易成本存在的最时尚表达，他写道：

“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成功；各国围绕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 5 页）

或许，文明才是人类最后的部落，国家之间结盟的政治交易成本将随着文明类同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文明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结盟的政治交易成本将越大。不同国家将围绕共同的文明建立特殊的国家俱乐部——文明圈，这正是本文空间模型的基本结论。

下面，我们再回到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政治交易成本的其他来源。除文明之外，本文认为经济地理的远近当属最重要的政治交易成本来源。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经济呈现块状分布，不同经济体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专业化生产，并经由贸易途径与其他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张以生产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版图。这样，当两个经济体在经济版图上越邻近——即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他们就越有动机在政治上保持合作，因为他们一旦在政治上有所冲突，其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将相对越多。所以，经济地理上的远近将决定政治“交易成本”的大小。当然，这种来源于经济地理的交易成本与来源于文明的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其核心机制在于将经济利益作为政治合作的抵押。

（三）占领政策嬗变与战后日本发展

历史上，美苏争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极模型的最佳现实版本。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日实行占领政策，同时日本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实质上是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中间地带国家，考察美国在战后对日政策的多次改变，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体系转变对国家行为影响的重要现实证据。最初，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基调是惩罚性的，其目的是全面粉碎日本的战争能力，将日本经济的未来束缚在第三流国家的行列，使得日本达到“去军事化”状态。然而随着国际体系

的变化，特别是美苏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两极对垒的国际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转变其对日占领政策，由之前的“削弱政策”改为“缓和的与温情脉脉的东西”（小林义雄，1985）。美国政策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因为美国要在东亚乃至全球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它必须在东亚地区争取和培育足够实力的盟友。因此，在两极世界体系下，美国理性地给予日本“租金”或者说援助，而这些援助很快使得日本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可以说，日本的战后发展得益于两极体系下的美苏争霸。对于该结论，日本学者高桥龟吉（1984）有过论述，他认为战后日本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但其成功的“首要的根本原因”是外因，即美国占领政策的改变，他指出，“由于美苏矛盾激化，美国政策才发生了变化”。直到战后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这种“租金转移”才再一次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改变而终止，而此时，日本经济已经走上了腾飞之路。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1971年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大门，再到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两极格局。对于美日关系来说，这种结构的再度改变直接意味着“租金转移”的改变，有日本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饭田经夫等，1986）：“日本在战后二十年枕惯了美国的温室”，这种体系转变引起的美国政策变革让日本必须“直接面对国际社会的寒风”。

（四）两岸“外交战”

正如前文指出，虽然本文以国际体系为背景进行理论分析，但所得到的结论却适合于其他层次的政治市场。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隶属中国内政，然而由于客观原因，台湾问题往往牵扯到国际外交层面的事务，形成所谓的“国际涉台问题”，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岸的“外交战”。一般来说，建交国多寡是一国政府得到国际认可的标准，体现了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国际承认度，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两岸一直都在“邦交国”数目上进行攻防战。1950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86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17个，台湾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37；1972年是两岸“外交战”的转折点，当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146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82个，台湾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42个；此后，两岸的“外交战”一直保持着这种扭转之势，2006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193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168个，台湾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24；在200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又增加3个，总数达到171个。所以，经过一甲子的风云变迁，两岸外交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陆实力与国际政治结构的变迁，比如70年代初的“外交”格局变化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推动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动，从而引发其他国家外交行为的调整。基于本文的理论，此处重点分析台湾所谓“务实外交”的

前期数据来源于黄嘉树和林红（2007），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2007年12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chn/lbfw/jibiaot9650.htm>，2009年2月19日。

本质。

从图 2 可以看出，当前两岸的外交对垒的结果已经非常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远远多于台湾的“邦交国”数目。然而，台湾当局在部分以台独为政治目标的地区领导人控制下，为了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一直没有放弃与大陆之间的“外交”较量。根据本文的两极模型，台湾当局在“规模收益”和“基本盘”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其唯一的外交筹码就是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租金”，事实上，台湾当局所谓的“务实外交”正是采用了该策略。黄嘉树和林红（2007）总结了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三大“新招式”：高层外访、经援外交和全民外交。但是，不管这三大招以什么形式存在，其背后都少不了“金钱”的影子。正如大部分学者认识到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援助或投资，对外援助的旗帜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其本质都是政治性的。所以，用经济利益换取“外交关系”是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本质，给予丰厚的“经济租金”成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外交”手段。表 1 总结了 2000 年到 2006 年陈水扁上台以后的主要对外经援活动。

表 1 陈水扁上台以后的主要对外经援活动（2000-2006）

时间	国家	金额（美元）	时间	国家	金额（美元）
2000.08	布基纳法索	3000 万	2004.09	马绍尔	4000 万
2001.07	所罗门	2500 万	2004.10	尼加拉瓜	150 万
2002.07	海地	5500 万	2004.10	瓦努阿图	60 亿（五年内）
2002.09	格林纳达	36 万	2005.09	中美洲与加勒比海	2.5 亿
2003.11	巴拿马	1700 万	2005.11	塞内加尔	50 亿新台币
2004.02	斯里巴斯	每年 800 万	2006.03	缙鲁共和国	1550 万
2004.09	格林纳达	4470.5 万	2006.05	巴拉圭	5 亿

数据整理自：黄嘉树、林红（2007），第 96-99 页。

四、结论与研究方向

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是以国际体系为背景展开论述，但如上文所强调的，本文的结论并不依赖于该背景。下面，本文给出更一般性结论：政治市场结构将通过不同政治行为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影响利益分配，如果将政治行为体分为两类，主导者（如国家极）和参与者（其他结盟国家），那么（1）在垄断政治市场结构下，即主导者具有绝对垄断权，他就会利用这种垄断权力进行寻租，从而扭曲利益分配，使得参与者的参与者剩余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者；该结论为思考“中心——边缘”格局下的财富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暗示了该格局下的发展陷阱。（2）主导者竞争的引入将导致利益发生逆向分配，以双寡头政治市场为例，由于存在竞争约束，作为寡头的主导者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得不将自己的主导者剩余作为竞争租

金转移给参与者，这一点在关键投票情形表现的淋漓尽致。该结论对于解释战后日本的崛起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揭示了台湾所谓“务实外交”的本质。（3）政治结盟具有内在的分布特征：基本面+可调节面，该结论与竞争选举理论是一致的；另外，我们重点分析了造成这种分布特征的来源，即意识形态差异、文明的冲突以及经济地理的远近，这三点构成了本文空间模型的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只是在给定政治市场结构下研究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即宏观架构如何影响微观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从而研究政治市场结构本身的动态变迁过程，即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决定宏观架构，这一点在模型附注中略有说明。比如，在垄断模型部分，我们可以考虑租金的动态优化检验霸权稳定论，正如奥尔森（2005）所指出的，租金的动态优化问题将直接导致霸权的兴衰。另外，本文的一个前提是政治行为体可以自由选择，但是现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理想状态，比如，在国际体系中往往伴有武力威慑，它的存在会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以及在动态模型中如何影响利益分配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亨廷顿 (200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Huntington P. Samuel: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7.
- 蔡翠红、倪世雄 (2006):《国际体系解构分析:结构、变迁与动力》,《教学与研究》第7期。
- 谢林 (2005):《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谢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Schelling C. Thomas: “*Micromotives and Macrobbehavior*.” Norton, 2006.
- 泰勒尔 (1997):《产业组织理论》,张维迎总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Tirole Jea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IT Press, 1993.
- 沃勒斯坦 (2000):《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Wallerstein M.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ademic Press, 1974.
- 小林义雄 (1985):《战后日本经济史》,孙汉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高桥龟吉 (1984):《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宋绍英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饭田经夫等 (1986):《现代日本经济史——战后三十年的历程》,马君雷等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 黄嘉树、林红 (2007):《两岸外交战——美国因素制约下的国际涉台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奥尔森 (2005):《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Basic Books, 2000.
- 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The Size of Nations*.” MA: The MIT Press, 2003.
- Alberto, Alesina; Ignazio, Angeloni and Federico, Eto. “*International Un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 2005, pp. 602-615.
- Bolton, Patrick and Gerard, Roland. “*The Breakup of N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 1997, pp. 1057-1090.
- Salop, 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 Goods*.”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1979, pp. 141-156.